

比较文明视角下的欧洲与中东： 同源性与异质化的历史考察

□ 哈全安

人种的同源与交往的绵延

从地图上东半球,便会发现,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和撒哈拉沙漠宛若天然的屏障,构成不同地理单元的分界线,长期以来阻隔着人类的交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地理单元决定着相应的人种分布,进而形成风格不同的地缘文化,历史进程亦迥然各异。

东半球的三大人种,分别称作蒙古利亚人种、尼格罗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其中,蒙古利亚人种主要分布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东亚以及东北亚、东南亚,操汉藏语系、乌拉尔语系、南岛语系的不同语言;尼格罗人种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所操语言大都属于班图语系的不同分支。相比之下,大西洋以东和波斯湾以南的欧洲和中东的广袤大地,可谓欧罗巴人种诸多分支的共同家园,欧洲人口所操语言普遍属于印欧语系的不同语族,中东人口所操语言大都属于闪米特语系和印欧语系诸语族以及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人种分布表现为明显的同源性。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往来频繁,爱琴海和地中海则是连接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的桥梁。位于地中海东端的克里特岛,作为古希腊文明的源头,融入了中东古代文明的诸多元素,印证了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之间的尘封往事。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延续长达半个世纪,爱琴海世界成为双方角逐的战场。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帝国统率希腊联军东征,横扫波斯帝国,深入中东腹地,开启希腊化时代的先河,给中东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欧洲文明的元素。继希腊化时代之后,欧洲与中东之间的交往,表现为罗马一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安息王朝及萨珊王朝之间的长期对峙,幼发拉底河流

域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直至形成东西对峙的地缘政治格局。

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人悄然崛起,作为崭新的统治民族登上中东的历史舞台,先后三次兵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此后数百年间,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东方丰富的物产、先进的技术以及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传入欧洲大陆的重要通道。历时长达近两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无疑是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之间在中古时代的又一次激烈碰撞,欧洲与中东之间的商业贸易交往亦随之渐趋活跃。14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崛起,兼并安纳托利亚,征服巴尔干半岛,降服阿拉伯世界,所向披靡,直至深入欧洲腹地,兵临维也纳城下,开创六百年基业,占据地中海世界半壁江山。

残酷的征战贯穿着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的漫长历史进程,导致两者之间地缘政治界限的模糊性和极度不确定性。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诸多现代民族国家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欧亚之间的地缘政治疆域渐趋固化。

一神信仰的宗教传承

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的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同源性,一神崇拜的宗教信仰自大约三千年前在地中海东岸崭露头角。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皆以一神崇拜而著称于世,其诸多神学理念可谓一脉相承。地中海东岸的古城耶路撒冷,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皆视之为各自的宗教圣地。起源于伊朗高原而备受波斯帝国尊崇的琐罗亚斯德教,可谓古代波斯文化的标志和象征,内含一神信仰的神学元素,亦曾在中东产生深远的影响。

起源于巴勒斯坦的犹太教,首开人类社会一神崇拜之宗教信仰的先河。公元后最初数百年间,

基督教在中东一带流行甚广,包括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和埃及在内的中东诸地曾经元初,独立行使司法权力,教会学校则控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中古时代欧洲文明的浓厚宗教色彩。相较于同时期的欧洲文明,伊斯兰教作为中东文明的特定元素,诞生在阿拉伯半岛原始社会解体的历史背景之下,宗教的传播与国家的形成处于同步状态,教权与俗权浑然一体,教法即为国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教会体系则无从谈起。

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皆曾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即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基于教俗二元元的特定历史背景,欧洲文明的社会转型与世俗化呈现出明显的同步趋势。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以因信称义为核心,旨在淡化教会和教士的宗教特权,无疑奏响了欧洲文明世俗化的序曲,排斥教会公权则是欧洲文明世俗化的政治主题。而中东现代化进程长期延续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错综交织的历史传统,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激烈博弈,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错综交织的教权与俗权

中古时代的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皆具有宗教政治的浓厚色彩,教权构成不可或缺的政治元素。然而,由于具体历史环境的差异,教权在中古时代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所处的地位不尽相同。

作为欧洲文明的重要元素,缘起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长期被排斥在罗马帝国的官方体制之外,自成体系,直到4世纪逐渐取得合法地位。此后,基督教的正统流派逐渐融入官方体制,进而在中古时代被赋予公权的属性。在中古时代欧洲文明的显著特征在于教权与俗权长期并存的二元政治体系,教皇与君王分享国家公权,教权与俗权互为制衡,教皇治下的教会与君王治下的国家泾渭分明。教会拥有庞大的地产和丰厚的财富,隶属于

教会的宗教法庭,与领主法庭、城市法庭甚至王室法庭处于平行的地位,独立行使司法权力,教会学校则控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中古时代欧洲文明的浓厚宗教色彩。相较于同时期的欧洲文明,伊斯兰教作为中东文明的特定元素,诞生在阿拉伯半岛原始社会解体的历史背景之下,宗教的传播与国家的形成处于同步状态,教权与俗权浑然一体,教法即为国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教会体系则无从谈起。

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皆曾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即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基于教俗二元元的特定历史背景,欧洲文明的社会转型与世俗化呈现出明显的同步趋势。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以因信称义为核心,旨在淡化教会和教士的宗教特权,无疑奏响了欧洲文明世俗化的序曲,排斥教会公权则是欧洲文明世俗化的政治主题。而中东现代化进程长期延续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错综交织的历史传统,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激烈博弈,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近代以来的历史分野

欧洲与中东之间具有密切的地缘政治联系。近代以来,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直至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现代化进程长足进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欧洲迅速崛起,而中东尚处于沉睡状态,由此形成两者之间的巨大历史落差。欧洲现代文明的冲击,侵蚀着中东传统文明和旧秩序的根基,沉睡的中东逐渐从梦中醒来,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相继浮出水面,经济社会层面的转型进程随之启动。

近代初期,奥斯曼帝国雄居中东,保持扩张态势,其在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对峙中占据上风。自工业革命起,欧洲与中东之间的实

力天平日渐倾斜。进入19世纪,殖民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奥斯曼帝国的辽阔疆域成为欧洲列强竞相蚕食和瓜分的所谓东方遗产。往昔如日中天的庞大帝国已成长日落之势,风雨飘摇。殖民主义成为其间欧洲文明的时代符号,中东则发出反抗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强烈呼声。

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诞生了土耳其共和国和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法两国是在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欧洲大国,英国控制埃及、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黎巴嫩则是法国的殖民领地。中东诸多新兴国家大都由欧洲列强操纵建立,尚无主权独立可言,去殖民主义化成为诸多新兴国家的首要历史任务,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政治的主旋律。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时代宣告终结,诸多新兴主权国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中东古老的土地释放出崭新活力和勃勃生机,现代化进程长足进步,欧洲列强主宰中东的时代亦由此终结。

新世纪初,中东局势剧烈动荡,政治强人纷纷落马,加之域外大国频频插手干涉,诸多国家秩序失控,家园毁于战火,背井离乡者不计其数,形成史无前例的难民潮。中东难民主要来自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难民潮的根本成因在于西方军事入侵和武装干涉摧毁原有的国家秩序,引发政治暴力泛滥,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中东与欧洲一衣带水;稳定的中东符合欧洲的战略利益,中东乱局的加剧势必殃及欧洲的安全。近年来中东难民大举涌入欧洲,欧洲诸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文明交融中的埃塞克亚灌溉系统

□ 郑晓云

在人类历史上,灌溉不仅是农业发展的基础,而且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研究表明,包括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在内的人类早期文明的兴起和发展都与灌溉有直接关系。早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500年,尼罗河谷就开始了灌溉。在非洲、亚洲、美洲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灌溉也存在了数千年历史。灌溉使得人们能够拓展水资源的利用,扩大生产规模,维系人类生计。对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灌溉成为农业生产的补充,而对于季风影响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或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手段。埃塞克亚灌溉系统正是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跨越了时间、空间乃至于文明的水利系统。

埃塞克亚灌溉系统起源于中亚、北非地区,其具体的起源时间已经很难追溯。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些区域的灌溉发展较早并且较为成熟。文献记载,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已经修建了庞大的坎儿井灌溉系统进行生活用水供给和农业灌溉,坎儿井引水灌溉系统在东亚和北非都有广泛分布,成为当地重要的生计支撑。除了坎儿井以外,结合了技术和管理制度为一体的小型灌溉系统在当地社区生活和农业生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干旱半干旱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刺激了灌溉技术在当地的发展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埃塞克亚灌溉系统由上述结合技术和管理制度为一体的小型灌溉系统发展而来。从技术层面来说,这种灌溉系统是一个河流引水系统,通过在河流上筑坝提高水位,应用自然的引力原理,修建水渠将水引到农田中进行灌溉。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农田用地的数量、农田分布、所有权等条件,修建更多的水渠

水沟,使水能够达到每一块农田进行灌溉。从制度层面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包括分配水的规则、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结合,才使得这一灌溉系统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地发挥了作用,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的水利系统之一。

公元8世纪初,来自中亚地区的摩尔人和北非的柏柏尔人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开始了长达近800年的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属于地中海气候,冬季温暖,夏季酷热,水资源的获得主要依靠降雨。为确保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必须修建灌溉系统进行引水灌溉。阿拉伯人将中亚的灌溉技术带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并且传播开来,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修建了很多灌溉设施。埃塞克亚灌溉系统在此期间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它集合了阿拉伯人传统的历史经验、智慧和知识,同时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水利技术,从而融合创造了适应当地的水利灌溉系统。到了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灌溉系统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并且改变了当地整个农业灌溉的面貌,甚至是自然景观。如埃尔切地区就是由于埃塞克亚灌溉系统的修建而由沙漠变成绿洲,今天这里仍然可以看到大片椰枣树林环绕着的农田以及掩映在椰枣树林中的城市。在埃尔切市的郊区,多条修建于公元10世纪前后的引水渠至今依然在运行,成为城市供水和农业灌溉的重要补充。

瓦伦西亚地区是伊比利亚半岛上埃塞克亚灌溉系统发展最完善的地区。这是一个半干旱地区和海岸沼泽地组成的地区,灌溉系统的修建使得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人居环境和农业发展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在中古世纪时,该地区修建了8条引水渠将河水引到农田中进行灌溉,从而成为伊比利亚半岛最重要

的农业产区。瓦伦西亚的农业灌溉发展和管理也最能反映出埃塞克亚灌溉系统的特性。当地的农田从中古世纪以来就是私有化的,产权关系复杂,农田被不同的产权关系分割成碎片状态,最大的一块私有产权的农田面积不超过10亩。在这里,土地权和水权是合二为一的,拥有土地者首先要拥有水权。水资源也决定了人们的水利组织和社区关系。

因此,将引水渠中的水科学有效地分配到数以百计甚至上千块农田中,并且保持水的畅通和有效灌溉,就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难题,更具有制度管理上的复杂性,而埃塞克亚灌溉系统正是在一个技术和管理制度两方面结合的灌溉系统。为了解决水资源纠纷,公元11世纪初建立了瓦伦西亚水法庭。今天这个法庭每周四上午依然坚持开庭,法官和当地的灌溉农户代表协商解决相关的水资源管理问题。正是因为有了水法庭对当地农业灌溉水资源的有效管理,才使得当地水资源利用和农业生产获得了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基本社会单位是由每条水渠的灌溉者组成的社区,每个社区选举代表,最终由代表组成社区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水资源分配。

灌溉的发展也使得新的作物种植成为可能。阿拉伯人把其他地方的农作物引入伊比利亚半岛进行种植并获得了成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例如从大马士革引进椰枣树,从君士坦丁堡引进无花果,从中亚引入棉花等。

到13世纪,阿拉伯人被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以后,这一灌溉系统虽然有着深深的阿拉伯文化烙印,但是并没有被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人遗弃,而是被完全继承下来并且加以发展。16世纪,以胡安·奥菲亚特为首的西班牙殖民者将西班牙灌溉



11世纪阿拉伯人在埃尔切地区修建的埃塞克亚拦水坝

知识带到了美洲,包括相关技术和管理法律制度,尤其是直接来源于瓦伦西亚水法庭已经成熟的法律规范。西班牙殖民者运用成熟的埃塞克亚灌溉系统,将河流中的水引入河谷更宽阔的地带,建设居民区并且进行农业灌溉、发展畜牧业。对这种灌溉系统的依赖,至今已经延续了近500年。在今天的美国新墨西哥州北部,仍然有800多条埃塞克亚引水渠。当然,美洲当地的印第安人使用灌溉系统进行大规模农业灌溉也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历史。西班牙殖民者随后也吸收了当地印第安人的灌溉知识,发展起了有别于西班牙的灌溉系统,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班牙文化与当地印第安人文化的融合。

埃塞克亚灌溉系统对美洲西班牙人的社会组织构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的社会组织关系往往围绕着灌溉系统展开,基层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管理水资源的组织,社区也是以引水渠流域为范围构成的。引水渠灌溉农户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在管理水资源、调节水资源纠纷的同时,管理当地的其他社区事务。因此,在新墨西哥州,社区灌溉组织往往是一个县管辖之下唯一的基层社区组织。除了日常活动之外,他们还召开会议讨论批准当地社区的管理条例、选举当地政府的组织机构人员。一个灌溉

区往往还有自己的教堂。总之,水利灌溉对当地基层社会组织的重要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班牙人在17世纪以后也将这种灌溉技术带到了菲律宾。在菲律宾北伊洛克斯、伊洛卡洛斯等省区都存在一种称为桑耶拉的灌溉系统。这种灌溉系统所实行的技术和管理制度,与埃塞克亚基本一致。相关的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研究也表明,桑耶拉灌溉系统是由17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在当地推广建设并融入当地社会中的。尽管今天在使用这种灌溉系统的社区中已经找不到西班牙人的痕迹,但是灌溉系统中的很多词语都来源于西班牙语。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的一些社区中仍然保留有西班牙语写的关于灌溉管理的文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探讨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埃塞克亚灌溉系统和菲律宾的桑耶拉灌溉系统之后,指出桑耶拉是一种融合了西班牙传统的灌溉系统。

从中亚、北非地区到伊比利亚半岛等其他地中海地区,再到美洲、亚洲,埃塞克亚灌溉系统经历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跨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明的交融,时至今日依然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阿兰·柯尔班(1936—)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开创了别开生面的感官史和情感史研究路径,以一种尝试脱离结构主义的方式观察法国历史上的社会。柯尔班走上这样一条研究道路并非一蹴而就,从其个人经历来看,他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学术转向。

柯尔班自中学时代就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在卡昂大学师承著名古希腊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盖,正式进入史学领域。1973年,他完成了国家博士论文《19世纪利穆赞的怀旧与现代》。这一时期正是经济社会史在法国上升为显学的时代,拉布鲁斯和布罗代尔两位大师正在努力打造一种以结构主义为导向的史学。所谓结构主义,即将历史上的文化现象看作是某种系统,分析其内部各成分之间结构关系的研究取向。柯尔班未能免俗,他受到拉布鲁斯的影响,决心致力于价格史的研究。然而,柯尔班在遵循这一研究思路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不得不放弃价格史研究而转向其他领域。

1982年,柯尔班正式投身于感官史的写作,出版了《瘴气与黄水仙:18—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以下简称《瘴气与黄水仙》)。这本书标志着柯尔班在史学领域开辟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成为史学界第一位以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法国近代社会嗅觉系统的历史学家。在书中,他兴致盎然地考察了暗示着不安和疾病的臭味(瘴气)如何成为普通民众乃至政府官员关注的对象,以及人们选择了何种办法用别的气味取而代之,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寻求自我认同的资产阶级掌握了主动权。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对瘴气和香气从无视到重视的转变,以及当局对不正常的气味的情绪投射出一段别开生面的社会大历史。

柯尔班的研究并未止步于嗅觉。1994年,柯尔班出版了《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声响格局和感官文化》(以下简称《大地的钟声》)一书,其思考又转向听觉。在种类繁多的声音中,他选取了在法国乡村社会中无论对农民还是私生活还是公共生活都举足轻重的钟声。柯尔班在勾勒以钟声为典型的法国乡村声响格局的同时,凸显了以教会力量为主的官方权力与世俗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他发现,由于时钟和报刊的普及,乡村社会对钟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在世俗化的进程中,钟也幻化成怀古之情的载体。总之,以复制勒高夫的模式。以《大地的钟声》和《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为例,二者都着眼于历史上的钟声,但前者强调乡村社会的权力争夺和民众对钟声的情感寄托,而后者则突出钟声对教会时间、商人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划分。柯尔班没有在设定的系统中分析各结构之间的关系,其论述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明显,这种看似杂乱的浪漫主义甚至某些感官的变化或人们对某些事物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无论是1995年出版的《消逝的降临(1850—1960)》、1998年的《路易·弗朗索瓦·皮纳哥找回的奇迹》、2007年的《快感和和谐》,还是近年来的成果:2013年的《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2016年的《静谧史: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和2018年的《草地的真实——亘古系列情感史》,无不体现出他的这种转向。

柯尔班在转向情感史的写作过程中曾坦言,材料在情感史的构建过程中是最大的难点,以文学和管理制度的文本来解释历史,必须掌握表象系统,一旦运用得当,最终的结论会改变人们对某些事情的刻板印象。他在《19世纪利穆赞的怀旧与现代》《瘴气与黄水仙》《大地的钟声》这几本早期著作中所引用的材料多为官方和私人档案等历史学科认可的文献。不过,近年来他所出版的情感史著作不再受限于经典的史料,而是大量引用文学、艺术作品和艺术作品来追溯城市资产生产者复杂的情感流变,这一路径与法国著名的“星期天历史学家”菲

利普·阿里埃斯的研究趋同。这样的研究取向也使得柯尔班面临学界的质疑和批评,因为以文证史在文本内容选择及其与史料互证方面在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频繁使用超出自己的文献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观点的权威性。而且,他在学术考据过程中总会加入对研究对象的感性描写,这使恪守客观原则的大部分史学家颇为不适,对其著作的严谨性也有减损。这是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潮在法国史学界造成的印迹。此外,柯尔班的研究有明显的跨学科倾向,他致力于将文学、美学、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不留痕迹地结合在一起,不过有学者认为这种整合过于刻意。

柯尔班自称对感官史和情感史的钟情源自年羹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但在实践操作中,他的学术路径与勒高夫更为接近。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言费弗尔对自己日后跳出年鉴学派的研究路径影响至深。费弗尔在1953年出版的《为历史而战》一书中倡导学界开展“历史心理学”“心理史”或“感官史”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心态史研究有所突破,勒高夫在这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他的部分代表作,如《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二者都着眼于历史上的钟声,但前者强调乡村社会的权力争夺和民众对钟声的情感寄托,而后者则突出钟声对教会时间、商人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划分。柯尔班没有在设定的系统中分析各结构之间的关系,其论述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明显,这种看似杂乱的浪漫主义甚至某些感官的变化或人们对某些事物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无论是1995年出版的《消逝的降临(1850—1960)》、1998年的《路易·弗朗索瓦·皮纳哥找回的奇迹》、2007年的《快感和和谐》,还是近年来的成果:2013年的《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2016年的《静谧史: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和2018年的《草地的真实——亘古系列情感史》,无不体现出他的这种转向。

总之,柯尔班选择了一种背离结构主义,着眼于感觉、感官、情感、意识的历史,这一学术导向使其与20世纪70年代如日中天的年鉴学派关系“复杂”。一方面,他的学术导向受益于该学派创始人的启发;另一方面,他付诸实践的研究偏离了该学派坚持的路线。他的《瘴气与黄水仙》出版后在年鉴学派那里不受待见,在史学界也遭受冷遇。一直到帕特里克·莱斯金德(中文译名为徐四金,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及影视编剧)于1985年出版畅销小说《香水》并宣称受《瘴气与黄水仙》启发较深,柯尔班遭受冷遇的状况才得以改观。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开 创 者

柯尔班

世界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654
邮箱:gmbsjs@163.com